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

苏州古城考古 为吴越融入“大一统”进程提供实证

新华社记者 朱筱

苏州姑苏区内，越城遗址东北部，试运营一个多月的苏州考古博物馆于7月1日正式开放。在这个以苏州出土陶器为展品基础、展示吴地人类历史文化演进历程的博物馆内，从混堂巷北遗址出土的“吴市”陶片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

据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馆长程义介绍，混堂巷北遗址地处苏州古城相门内西北侧，2024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其中一件颇具研究价值的秦代“吴市”陶片长约13厘米，宽约8厘米，弧形不规则，上面刻有的“吴市”二字清晰可见。

据悉，“吴市”即吴县的市场，是负责管理商品交易的机构，其发现实证秦代已在吴地推行市亭制度，为秦会稽郡治在苏州古城提供佐证。“市亭制度是秦代统一市场管理制度的重要措施之

一，纳入帝国版图的吴越旧地也执行了和关中、关东等地一样的管理制度，显示出大一统王朝对周边强有力的控制。”程义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在苏州古城发现的唯一一件印有“吴市”的陶器。2024年，位于姑苏区的另一处北园遗址还出土了两件戳印“吴市”陶文的陶罐及组合器，发掘团队认为是秦统一江南后的官作陶器，为极具断代价值的标准器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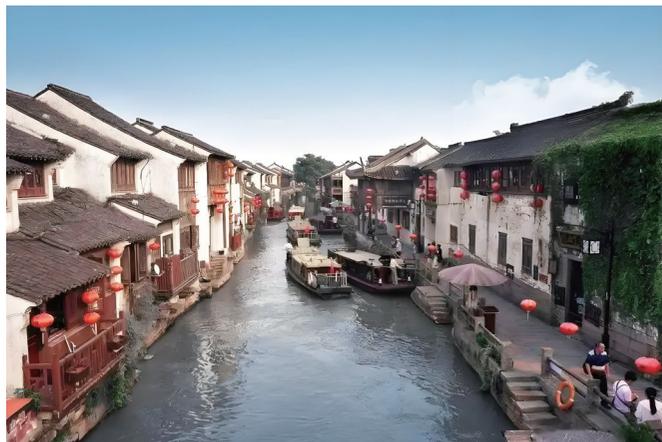
程义说，混堂巷北遗址与北园遗址出土的三例“吴市”陶文，是继广州“女(汝)市”、上海青浦“吴市”之后，南方地区发现的第三批秦陶文。特别是北园遗址和混堂巷北遗址陶文“吴”字的写法明显不同，前者为典型的秦篆，后者为六国文字写法，这一差异为研究“书同文”制度推行提供了典型案例。

除了混堂巷北及北园遗址的发现，地处苏州公园

北侧的金城新村遗址，近年来发现遗迹现象30余处，出土完整及可复原器物300余件(组)，对南方秦汉考古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该遗址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在江南地区发现并识别出了一批秦代文物，为苏州城市考古首次发现。特别是大量密集性叠压堆积的筒瓦、板瓦、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在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上，与陕甘地区秦代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物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该遗址发现的部分陶罐、筒瓦等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被成套展示在苏州考古博物馆内。不少游客参观时，会特意去寻找一片带“右”字戳印铭文的陶筒瓦。馆内工作人员介绍，它指向的是秦代从事砖瓦烧制的工官机构“右司空”，“右”字陶片过去出土于秦宫、秦陵等秦代高等级建筑遗址。



网络图片

在程义看来，秦统一之后，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举措，金城新村遗址发现的统一规制的官方建筑，以及混堂巷北、北园遗址出土的反映市场制度的“吴市”陶器，正是秦推行大一统制度的实物见证，表明地处江南的吴越旧地，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范围。

“综合这三处遗址的发现，可以勾勒出吴越地区融入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历史进程的更多细节。”程义说，秦统一六国后，在新征服区可能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定修建了地方官方建筑，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虽然官方建筑构件采用了核心区的规制，但

日用之物多见具有浓郁楚国风格的陶器，这种明显的差异反映出中央政权对带有官方色彩的建筑采用了统一标准，而对民间日用陶器采取了因地制宜、尊重地方传统的措施。

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保存有完好的城垣、城门和水陆交通体系。学者一般认为苏州古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先后经过春秋吴国、战国越国、楚国、秦汉、六朝、隋唐及以后的朝代，并一直延续至今，是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这些发掘的遗址如同浓缩苏州古城历史的‘时间胶囊’，有助于帮助我们打捞起苏州古城的千年回忆。”程义说。

新华社南京7月1日电

约古宗列曲：沿着黄河正源的文明溯流

约古宗列曲附近。这是6月25日拍摄的。新华社记者 王艳摄



新华社西宁7月1日电 (记者 白玛央措 王艳 耿辉 凰)清晨的阳光将玉珠峰北麓染得微黄，记者裹紧冲锋衣登上越野车，跟随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考团队，向着海拔4700米左右的黄河正源约古宗列曲进发。

道路颠簸，海拔不断攀升，最高时超过了4800米。头痛、胸闷的高反症状不时袭来，但眼前变换的自然风光让人顾不上身体的不适。4小时后，科考团队抵达雅拉达泽，这座藏语意为“牛角虎峰”的山峰矗立在眼前。

“雅拉达泽也被称作‘昆仑之心’”，对讲机里传来专家的讲解。雅拉达泽位于青海省中部偏西的巴颜喀拉山

脉西端，主峰海拔5214米，是黄河的发源地之一，其雪山区是三条大河流的分水岭，雪山东侧的水网汇成黄河，西侧发育了长江上游通天河系，北边则是内陆河格尔木河的源头水系。

雅拉达泽脚下的夏季草场上，32岁的牧民青美仁增正在放牧。他戴着黑色的帽子和围脖，只露出一双被高原烈风灼红，却炯炯有神的眼睛。聊天中得知，他已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放牧半年，每天照顾200多只羊。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远处山坡上有一团黑影攒动。“那儿有50多头野牦牛，能看清吗？”他笑着说，这片草场上野牦牛是老大，棕熊排老

二，野狼也只能算老三。多亏了两只牧羊犬日夜守护，他才能在夜晚的荒野里睡一会儿。

越野车继续在崎岖山路上颠簸，记者透过车窗，不时能看到几只藏野驴在广袤草地上撒欢奔跑，各种鸟类在空中翱翔。沿途还见到了人造鸟巢，这些用心设计的“空中家园”，为高原生灵们提供了更多栖息之所。

青海极地自然资源调查研究院院长张永通过对讲机介绍：“大家注意看路左侧这些紫色的花朵，之所以大朵大朵地盛开在草甸上，就是为了吸引更多蜜蜂授粉，这样它们的生命才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不断延续。”

经过近9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的约古宗列曲。很难想象，眼前的涓涓细流，最后能汇奔腾万里的黄河。“黄河源头在这起源以后，河流顺势而下，这一片开阔的地方就聚成叫约古宗列曲，藏语的意思就是‘炒青稞的锅’。”青海

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看到自己曾经亲手埋下的国家地理标志，眼角泛起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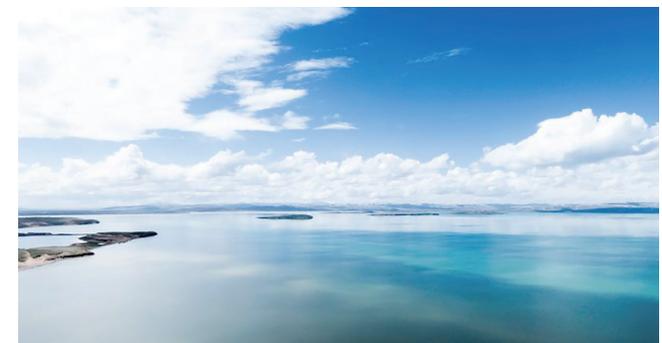
侯光良说，众多民族的古老传说中都留存着昆仑记忆，反映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早期印记。

第二天，记者跟随科考团队到达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扎陵湖、鄂陵湖等地。至此，这场在青海省境内首次开展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考活动，历时11天顺利完成。

由考古学、历史学、民族

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科考团队，横跨环青海湖地区、柴达木盆地、河源地区约35个考察点，每天最多时行驶约12个小时，在冻土与碎石路上颠簸上百公里。他们以脚步丈量土地，旨在通过科学严谨的实地考察，系统梳理昆仑文化元素和标识，解读展现青海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历史文脉。

这一路，记者深刻感受到，多年来人们追寻的不仅是黄河奔涌的起点、昆仑巍峨的脉络，更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绵延不息的文化根魂。



这是6月25日拍摄的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扎陵湖。新华社记者 王艳摄